

晚清民国时期豫南移民下江南的原因和方式

——基于移民后裔历史记忆的探讨

张 金 林

(信阳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河南 信阳 464000)

摘要: 太平天国战后至民国时期, 在人地矛盾、自然灾害、战乱等因素的作用下, 豫南人民大量向外迁移。由于土地荒芜、政府招垦、江南同豫南的自然环境类似以及豫南人民对江南的良好印象等原因, 江南成为豫南移民的主要目的地。豫南移民以血缘为纽带, 以家庭和宗族为单位, 源源不断地迁入江南。

关键词: 豫南移民; 移民后裔; 下江南; 历史记忆; 太平天国战争

中图分类号: K25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5261(2025)06-0126-08

DOI:10.14058/j.cnki.tzxk.2025.06.005

清咸同年间, 受太平天国战争的影响, 安徽、江苏、浙江等省土地荒芜, 人口锐减, 经济与社会遭到严重破坏。为恢复各省经济与社会, 清廷采取了招垦政策, 招募外地移民开垦荒地。由于地近江南且区域内生存压力较大, 豫南成为向皖、苏、浙三省输出移民的重要区域, 其移民活动从太平天国战争结束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其中, 仅光山一县“就向苏南、浙西、安徽和江西近 60 个地方输送了 100 万以上的农民”^①。豫南移民在向江南迁移时, 大都肩挑一副箩筐, 一头放着行李, 一头坐着子女, 被形象地称为“一担箩筐下江南”。

目前, 学术界已对豫南移民下江南的原因、过程、影响, 豫南移民的分布及其同当地民众的冲突与融合等问题进行了一定研究^②。本文以豫南移民后裔的回忆资料和口述资料为基础, 从历史记忆角度, 对豫南移民下江南的原因和方式进行深入探析。

一、豫南移民外迁的原因

太平天国战后至民国时期, 豫南移民大量向外迁移,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据豫南移民后裔的记忆, 主要有下述几方面的原因。

(一) 人地矛盾

人地矛盾是豫南移民外迁的根本原因。当土地不能承载过剩人口时, 为了生存, 过剩人口不得不向外迁移。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 康熙帝下诏:“承平日久, 生齿日繁。嗣后滋生户口, 勿庸更出丁钱, 即以本年丁数为定额, 著为令。”^{[1]281}雍正时期, 清廷废除了人头税, 实行摊丁入亩。在上述赋役制度改革的推动下, 豫南人口快速增长, 如光山县在康熙五十年“有口 40593”, 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有户 70716、口 222496”; 罗山县在康熙五十年“有口 8020”, 到乾隆六十年“有户 59709、口 297906”; 商城县在康熙二十八年“有口 7879”, 到了光绪中期,

收稿日期: 2024-02-21

基金项目: 信阳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23LS001)

作者简介: 张金林(1981—), 男, 河南息县人, 讲师, 博士。

人口达到了30余万^{[2]852}。人口大量增殖使得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以光山县为例，该县“南境多山田，缘岩被陇，斜畛侧町，几于无土不辟。北路平畴广衍，亦无隙地之旷。……近时生齿愈蕃，间有远趋陕、汝、桐柏诸地任土开垦者”^[3]。面对此种情形，豫南人民不得不向外迁移，以寻求出路。许多豫南移民后裔在追忆先辈下江南的原因时，都提到了人地矛盾突出的问题，如王心余认为，“人口暴增，很多老百姓处于衣食不保的境地”，是豫南人民大量向外迁移的原因。王心余的高祖父王永享是豫南移民的一员。1865年，王永享携妻带子，离开光山县劳山（今殷棚乡），辗转来到今安徽省郎溪县姚村乡夏桥村^{[4]62}。另据李祖仁说，其高祖父李士珑外迁的原因也是“家庭人多地少、入不敷出”。1875年，李士珑带领全家人离开罗山县山店乡胡畈村李坳，迁至浙江省湖州道场乡^{[5]448}。

（二）自然灾害

自然灾害是豫南移民外迁的主要原因。晚清民国时期，豫南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以罗山县为例，1864至1949年，该县发生水、旱、蝗、雹、风灾的年份分别有14年、15年、1年、7年、4年^[6]。同一时期，光山县发生水、旱、蝗、雪、雹、风、震灾的年份分别有8年、11年、7年、2年、3年、1年、2年^[7]。自然灾害往往造成饥荒，人民为了生存，不得不向外迁移。这一点在豫南移民后裔的追忆中，得到了充分印证。据汪心顺回忆，因“老家水灾、旱灾年年不断，生活无以为继”，他的高祖母带着5个儿子，于1890年离开罗山县周党镇，“踏上了前往江南的逃荒路”，最终到达今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5]407}。另据曾照兰回忆，清光绪末年，光山县

“连年大旱，庄稼颗粒无收，田边地头的野草也到了‘寸草不结籽’的地步”，其外公家“田地无收，家里存粮早已耗尽”^[8]，不得不外出逃荒，辗转湖北省汉口、安徽省宣城等地，最终在今安徽省广德市落户。何存美亦说，1910年前后，因为水灾，其“祖父及祖父的兄弟四五人”离开光山县凉亭乡鄢脂洼何洼，先逃荒到安徽广德市，后迁至今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吕家岗村^{[4]148}。

（三）战乱

战乱是豫南移民外迁的重要原因。豫南东临安徽，地近江南，受到捻军起义和太平天国战争的影响。早在19世纪初，豫南已有小股捻党活动。从1829年起，豫南捻党的声势日益浩大。1840年以后，豫南捻党同外地捻党建立了联系。1853年，太平军北伐，各地捻党纷纷响应，发展成捻军。1854年，捻军在豫南发展到10余万人。1866年，捻军离开豫南。捻军（党）在豫南活动期间，多次攻打州县城市。同时，太平军也多次进军豫南^{[2]6}。为了躲避战乱，豫南人民被迫向外迁移。一些豫南移民后裔在回顾先辈外迁原因时多提到“跑长毛”。所谓的“长毛”，是指捻军（党）和太平军，“跑长毛”就是躲避捻军（党）和太平军。安徽广德市邱村镇白云村的彭荣国说，其曾祖父从光山县青龙寨迁出的原因就是为了“跑长毛”^{[4]126}。同村的彭显扬也说，他的祖籍亦是光山县青龙寨，由于捻军攻打并烧毁了寨子，其“曾祖父的奶奶”带领“四个儿子以及自己的兄弟向江南迁徙”^{[4]130}。另据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松陵镇菀坪社区安湖村的杨文章追忆，由于罗山县“闹长毛”，他的“奶奶带着两个儿子走了一个多月，一路讨饭”来到了安湖村^{[5]444}。

（四）家庭变故

根据豫南移民后裔的回忆，家庭变故导致无法在原籍生活，也是一些豫南移民外迁的原因。如江苏省溧阳市上兴镇步村张方林的先辈因家庭纠纷而外迁：“清朝时我们张家有兄弟三人，老大、老二在京城做官，被奸人所害，兄弟俩同一天被杀，在光山的老三听到消息后，害怕被牵连，连夜带着家人挑着担子逃到句容。”张方林的外祖母出身于罗山县的望族毕家，也因家庭纠纷而南迁：“毕家在罗山是望族，家族中有个最小的姑娘（我六老太的妹妹）和家中长工相恋，

以致后来未婚成孕。为了不让家丑外扬，姑娘的母亲狠心让六老太用毒药将其女儿毒死。事情暴露后，他们觉得丢不起人，在罗山无法立足，于是就跟着南移的大潮，舍下房产带着钱财细软来到溧阳。”^{[4]152}据浙江省安吉县天子湖镇高禹村的柯红标回忆，其曾祖父因打输了同沈姓人家分地的官司，被判赔钱赔地，导致无法在老家生活，被迫离开今信阳市浉河区东双河镇周庙村南迁^{[5]345}。另据句容市天王镇中学的刘义志说，他的祖父与其兄弟因娶一女子发生了矛盾，于1860年前后离开光山县刘家湾下了江南^{[5]413}。此外，据句容市天王镇袁巷村的余兴祥说，他的祖籍是罗山县定远乡，“村里住着余家和张家两家，张家会玩皮影戏”，“余家与张家产生矛盾，将张家的人打死了，出了人命官司，于是逃往江南”^{[5]415}。

需要说明的是，豫南移民外迁通常是由多种因素共同造成的。如句容市天王镇袁巷村的刘业刚说，他的高祖父原居罗山县定远乡，由于“闹长毛”和连年灾荒，才南下谋生^{[5]418}。浙江省长兴县的罗山县移民后裔张本达也说，其家族外迁的原因是“在老家人多地少，自然灾害频繁，生活难以维持”^{[5]270}。

二、豫南移民迁居江南的原因

根据豫南移民后裔的记忆，豫南移民之所以选择江南作为最主要的迁移目的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战后江南人口锐减，土地荒芜

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江南是清军与太平军交战的主要区域。受战争影响，江南人口锐减，江苏省江宁府、苏州府、镇江府、常州府的人口损失分别是344.2万、425万、195.5万、260.5万，损失比例分别是76%、65%、79%、69%^{[9]425}；浙江省嘉兴府、湖州府的人口损失分别是213万、215万，损失比例分别是69.6%、75%^{[9]440, 449}；安徽省广德州、宁国府的人口损失分别是60.5万、380万，损失比例分别是93.5%、94%^{[9]456, 458}。人口损失严重，导致大量土地荒芜。宣城县（今安徽宣城市）“清咸丰年间，境内兵燹之后水灾相继、疫病大起，以致境东南一带，‘十室九空’、人少烟稀，土地荒芜、满目疮痍”^[10]；经过战争，句容县亦“赤地数百里”^[11]。大量荒芜土地为外来移民迁入提供了广阔空间。如安徽广德市桃州镇高湖村的光山县移民后裔李家国说：“听老辈人说，初来此地的时候，许多房屋都将要倒塌，有的床上还有尸骨。由于人口稀少，房屋谁先进去就是谁的，土地谁先开发就归谁所有。我的祖辈们来的时候以农业为生，后来清政府还承认了产权。”^{[4]122}江苏省宜兴市西渚镇横山村的光山县移民后裔舒纯毅也说：“曾祖父带着一家下江南到横山的时候，横山人很少，很多太平天国时因逃亡、被杀的人家房子空着，战后瘟疫造成死亡的人尸骨仍在床上，我曾祖父就找了没有人的房子住了下来”，“在空闲的地方开荒种地”^{[5]431}。浙江安吉县的罗山县移民后裔罗绍文也说：“这边在太平天国战争后已经没什么人了。曾祖父刚来的时候找到‘斗区’，自己开荒。”^{[5]352}

（二）清廷招垦政策的吸引

战后为恢复江南经济，清廷谕令各省招垦荒田^{[12]101}。在此政策影响下，“曾国藩于皖，杨昌濬于浙，皆分别土、客，部署开荒”^{[1]3506}。为招徕外地移民就垦，各省给出了非常优惠的条件。如两江总督曾国藩同安徽巡抚多次向河南等省发布文告，其中一个文告的大意是：“你们离开你们贫瘠之土，到这里肥沃之地来吧！让这些田地、这些房屋成为你们的不动产吧！头几年，你们可免交公粮，到了规定时期，你们再和其他人民同样地向朝廷纳税，共享同样利益。只要你们奉公守法，我们一致保护你们。”^[13]

在各省招垦政策的吸引下，豫南移民纷纷向江南迁移。据光山县移民后裔傅文荣追忆：“处于极端困境中的曾祖父傅敬宽获悉清政府下达移民政策后，如获至宝，欣喜若狂，奔走相告。

人往高处走，鸟往亮处飞。曾祖父经过再三斟酌，坚定了下江南的决心。”最终，傅敬宽带着5个儿子下了江南，到达今安徽广德市邱村镇赵村^{[4]90}。安徽郎溪县凌笪乡下吴村的光山县移民后裔谈应家也说：“祖上是根据清政府的招垦令，带着大爷、姑姑、小太太移民过来的。”^{[4]136}此外，浙江长兴县的任大晟说：“我的天祖任万金公、任万银公兄弟原是河南省汝宁府罗山县第三区万约莲花塘任家寨（今罗山县周党镇秦畈村任寨自然村）人。当时在罗山任寨也有些田产，看到江南招垦的告示，颇有冒险意识的他们兄弟俩一商议，便背上盘缠，带领几名长工，各挑着一担箩筐，装着路上吃的干粮和被褥，与族人结伴为数十人的队伍，一路上跋山涉水，风雨兼程地下了江南。”^{[5]232}

（三）对江南富庶的想象与向往

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在很多人的认知中，江南是富庶的代名词。如皖南花鼓戏《唐老三下江南》云：“昨日无事把集赶，耳听得众人等讲说一遍。有人说江南好水田，粟谷米能长到三尺三，棉花桃子赛鸡蛋。南瓜长得磨子园；人人说当年遭大难，洪扬扎在九华山，江南人儿发瘟死，全都是客家人种庄田。唐老三不信下河去看，背的背，挑的挑，都下江南……”^[4]豫南也流传着向往江南的俗语和民谣，如“宁往南方走一千（里），不往北方走一天”^{[4]3-4}、“要弄钱，上江南”^{[5]637}。以上美好想象，使得移民江南对豫南人民颇具吸引力。如罗山县移民后裔长兴超威集团行政总监、董事长助理罗明强说：他的曾祖父母之所以下江南，是因为“听说江南风调雨顺，有田种，有饭吃，饿不死，就是奔着一个饿不死的信念过来的”^{[5]369}。苏州市吴江区菀坪社区诚心村的光山县移民后裔曹世斌亦说：其父亲曹万泰兄弟4人下江南的原因是，“那时候都说江南好，江南有钞票”^{[4]160}。光山县移民后裔广德人曾晓闻也说，其先辈曾毓洲下江南的重要原因是，听说江南“到处是良田，吃饭管饱，不用交租钱”^{[4]102}。

（四）同豫南自然环境相似

豫南“处在南北过渡的气候带内，冬季温暖，夏季湿热，雨量丰沛，光照充足，适宜多种亚热带林木和暖温带草类的生长，因而处处显示出青山秀水的地貌景观，酷似江南风光”^{[2]1}。由于豫南与江南的自然环境相似，豫南移民选择江南作为目的地也就顺理成章了。据商城县移民后裔宜兴市张渚镇善卷村的郭晓春说：“河南人来到这里后，找的田地首先要有水，大都在山冲里，和老家差不多。”^{[5]438}南京市溧水区东屏镇的光山县移民后裔张世文也说，他的曾祖父之所以选择东屏作为落脚地，是因为听一位堂兄弟说东屏“全是丘陵，跟老家差不多，田地也很多”^{[5]394}。上文提到的浙江长兴县的任大晟亦说，其天祖任万金和任万银的落脚地广德州大东乡宋保村（今安徽广德市东亭乡颂祥村晏村自然村）的地形“与老家莲花塘极为相似”^{[5]233}。

除了上述原因，豫南移民迁居江南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如对豫南籍军人的安置和豫南籍官员的带动等。据句容市天王镇袁巷村的商城县移民后裔陈祖军说：“听我爷爷讲，我们家老祖宗在清朝时是当兵的，跟太平军打仗一路南下，当时家属随军，打完仗就落户在当地，落脚在龙山脚下的小红山。”^{[5]416}光山县移民后裔曾任广德县（今安徽广德市）副县长的罗正军指出：

“河南光州人李孟荃于同治年间出任广德知州，在家乡地方官的引导之下，包括光山、固始、商城等地的光州人民开始大量移居广德，并逐渐占据了当地人口的主体地位，广德之后又被称为‘小河南’。”^{[4]37}

三、豫南移民下江南的方式

太平天国战后至民国时期的豫南移民下江南活动经历了政府招垦和自行迁入两个阶段。二者大致以清同治末、光绪初年为分界^{[12]100}。同治末、光绪初年，皖、浙、苏三省停止了招垦。但是由于江南的巨大吸引力，豫南移民仍继续涌入。豫南移民下江南的方式，既有群体性的迁

移，亦有由民间“弱关系”网带动的迁移，还有无序、零散的迁移。群体性迁移主要发生在政府招垦阶段，由于政府的强力推动，大批豫南移民在较短时间内移居江南。群体性迁移的迁入地也比较集中。民间“弱关系”网带动的迁移是豫南移民下江南的主要方式，贯穿于豫南移民下江南活动的始终，这种迁移通过以先带后、以一带十、以老乡带老乡的方式进行。无序、零散性的迁移具有一定的偶然性，这种迁移在太平天国战前就已经开始，在太平天国战后至民国时期亦时有发生。总体而言，无论是群体性的迁移，还是“弱关系”网带动的迁移，抑或是无序、零散性的迁移，大都以血缘为纽带进行，具体可分为以家庭为单位的迁移和以宗族为单位的迁移。

（一）以家庭为单位的迁移

以家庭为单位的迁移是豫南移民下江南最常见的方式，其具体情况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探知。

首先，家庭成员的构成。一些家庭是夫妻双方或其中一人带领子女下江南。浙江安吉县天子湖镇高禹村的罗山县移民后裔高尤卿说：“太平天国后，先祖高廷哲携万氏带着四个孩子士珍、士成、士珠和士俊迁到这里。”^{[5]341}广德市邱村镇白云村的光山县移民后裔吴克发亦说：其曾祖父是“带着祖父吴克用等4个男孩下江南”的^{[4]124}。光山县移民后裔黄文龙说：“我爷爷的爷爷是个好吃懒做之人，成天迷于赌博，不顾家，一天到晚也见不到他人。又遇到多年的旱灾，全家人缺吃少穿，生活非常艰苦”，“我爷爷的奶奶是个实在了不起的妇女，看着这样的家和无用的丈夫，她毅然决然地一担箩筐挑起两个儿子，随着南下的人们跋山涉水，历尽艰辛，一路要饭，来到了如今的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东屏街道丽山居委会东流自然村”^{[4]99}。也有一些家庭是兄弟姐妹一同下江南。此种情况又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兄弟姐妹均已成婚并携带各自子女下江南；另一种是未婚的弟弟、妹妹跟随兄长及其子女一起下江南。据李家国说，他的“太爷爷和三个兄弟一起拖家带口，小孩子用箩筐挑着，一路朝着东南方向。最终迁移到现在的高湖村西沟”^{[4]122}。光山县移民后裔江苏宜兴市张渚镇善卷村的李为清亦说：“1907年，为逃春荒，我的曾祖父李之松同我的曾祖母携二子一女，连同他尚未成为家的弟弟李之财一起离开故土‘下江南’寻觅活路。”^{[4]44}此外，还有独自一人下江南的。苏州市吴江区松陵镇菀坪社区的商城县移民后裔廖肇友说：“据说当年因为浙江长兴这边发人瘟，左宗棠从河南迁出一大批人到长兴定居，太爷当年14岁，一个人就跟着这批移民过来了。”^{[5]446}

其次，家庭成员的代际。在家庭成员的代际上，以两代或三代人同下江南最为常见。如浙江长兴县泗安镇双联村3组的光山县移民后裔吴志林说：“我家来江南是我爷爷吴长力那一辈从老家躲‘长毛’跑过来的。当时老家生存不下去了。我爷爷挑着箩筐，一头放着我父亲，那时候我父亲刚满月；一边放着我大姑，大姑6岁；大爹是跟着走过来的。同来的还有我爷爷的弟兄叫吴长业，后来在安吉定居。”^{[4]141}据黄其富说，1931年，他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伯父、伯母、大哥（大伯的儿子）三代共7人离开光山县，在今浙江长兴县林城镇新华村安家^{[4]144}。另据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菀坪中学的罗山县移民后裔李国柱说，1900年，他的高祖李润和下江南时，将全家三代十几口人全部带到江南^{[5]305}。此外，还有一代人下江南的。如浙江长兴县林城乡乌泥斗村的罗山县移民后裔丁汉康说，他的高祖丁德成是只身一人同其他罗山老乡一起下江南的^{[5]285}。南京市溧水区白马镇革新村的罗山县移民后裔左文才说：“我们左家迁居江南是从我的老太（曾祖父）那一辈儿开始的。老太左宗兵（音）和他弟弟跟随当时下江南的大潮，来到这里。”^{[5]403}需要指出的是，两代和三代人下江南是主流，一代人次之，三代人以上非常罕见。

再次，家庭成员下江南的时间。豫南移民家庭成员下江南的时间可分为两种情形，即家庭成员同时下江南和家庭成员先后下江南。一些豫南移民在下江南时，其家庭成员是同时迁移到江南的。如江苏省溧阳市上兴镇蒲村的光山县移民后裔曾昭国说：“我的家族是从我的老太（曾

祖父)那一辈儿时搬过来的,距今大约有120年了。当时是我的里老太(曾祖母),带着爷爷他们六个兄弟、女儿和儿媳妇过来的。”^{[5]425}另据浙江长兴县和平镇便民桥村的张本达追忆,1866年,他的曾祖父张德忠带领全家人离开罗山县莽张镇,先到江西,后辗转至浙江^{[5]270}。一些豫南移民在下江南时采取的策略是:部分家庭成员先到江南,站稳脚跟后,其他成员再到江南。如光山县移民后裔向家龙追忆:“我的曾祖父向讳正和公、祖父向讳文忠公,于1888年初,一担箩筐下江南,投靠先前来溧阳上沛毛家的向福庭,昼佣夜耕,秋天收获40担稻。祖父于秋收后回信阳接其母及弟、妹三人来溧阳过年。1889年秋收后又回信阳接其姑父姑母、堂弟兄们7人。”^{[4]58}据南京市溧水区东屏镇的罗山县移民后裔蔡修宏说:“我大爷18岁时先来的江南,在这边给人当长工,干了两年后积攒了一些粮食,于是写信给家里。1912年,我的曾祖父夫妻俩带着我的高祖母和13岁的爷爷四个人下了江南。”^{[5]390}另据浙江长兴县的任大晟说,从同治五年(1866)前后开始,他的先辈祖孙三代历经10多年分3批迁至今安徽广德市东亭镇颂祥村宴村自然村^{[5]232}。

最后,家庭成员的完整性。一些家庭在下江南时,所有成员都迁移到了江南。据江苏省句容市郭庄镇王岗村的简恩承回忆,“光绪年间,河南光山县连年灾荒,甚至到了颗粒无收的绝境,饿死人无数”,在高祖父简琼全的带领下,全家“依依不舍地离开老家——河南省光山县晏河乡西简湾村,一步三回头地看三小间漏水的土坯稻草房,从此,再也没有回到过这儿了”^{[4]77}。南京市溧水区的光山县移民后裔简恩家在追忆简氏家族下江南的历史时说:“到达江南比较早的有简旺一家,兄弟四人,扶老携小全家一起来,老的挽小的,跋山涉水来到溧水东门二十里的方便,后扎根在里尼姑村。”^{[4]95}他还说,简琼信于1880年只身南下,在溧水东门二十里外的浮山庙叉子落脚,通过辛勤劳动,“三年下来已有了自己的田地,基础打下了,重返河南光山老家,将其全家全部接过来”^{[4]94}。一些家庭在下江南时,仅有部分成员迁到江南,其他成员则留在豫南老家。据黄文龙说,其高祖母带领曾祖父下江南时,他的高祖父“独自留在中原老家,失去了联系,至死也没有和他的家人见上一面”^{[4]99}。另据曾晓闻追忆,由于“年成不好,收成也很差”,其先辈曾毓洲的父亲用抽签的方式让3个儿子“分一个出去,或者搬到别处,或者南下江南”。通过抽签,曾毓洲被选中。最终,曾毓洲和妻子下了江南。曾毓洲的父母、大哥、大嫂、二哥则留在了光山县白雀园曾家畈老家^{[4]102}。罗山县移民后裔郭中柱也说:“光绪年间,高祖郭奠安病逝于罗山。为避乱世饥荒,由长子郭炳全留守老家,照看祖墓,高祖母郭洪氏携其次子郭炳福、三子郭炳荣、幺儿郭炳义,肩挑一担箩筐,千里跋涉,来到浙江省长兴县虹星桥镇邱汇桥自然村落户。”^{[5]264}

(二)以宗族为单位的迁移

根据豫南移民后裔的记忆,以家族为单位的迁移通常是部分家族成员先到江南,在江南站稳脚跟后,其他成员再陆续向江南迁移,并以先到成员的落脚地为基地,向其他地方辐射,即以先带后、以一带十,滚雪球式地向江南迁移。据简恩家回忆:“小的时候,就听爷爷经常讲我们的先辈从光山到江南的故事。早在130多年前,光山县简氏家族的有识之士,高瞻远瞩,就瞄上了江南这块土地。有的只身打探,有的扶老携幼,带着梦想,舍弃家园,不远千里,千辛万苦,肩挑背驮来到这里。一个看一个,一个带一个。先后来了30余户人”,“江苏省溧水东门二十里处,现东屏镇方便村、高塘华村、尼姑塘村(现被水库淹没)、侯谢村、庙叉子村、句容茅山脚下戴家塘村、葛村乡王岗村等,就是他们的落脚点,后溧水部分简姓也有逐步向句容县南部磨盘乡、袁巷乡、溧阳县、安徽省郎溪县、广德县及浙江的长兴县发展”^{[4]93}。另据任大晟追忆,从同治年间起,“罗山五知堂任氏各门便开始‘一担箩筐下江南’。下江南的时间有先有后,陆陆续续持续了大概70多年”^{[5]230}。至“光绪二十年左右,从罗山下江南的几十门任氏族

人在广德、长兴、苏州、湖州、孝丰等地”大都“扎稳了根”，并“具有了一定的实力”^{[5]235}。此外，安徽郎溪县凌笪乡下吴村的光山县移民后裔邱淑柳说：“我老祖太太下江南之前，祖太太堂兄弟们先来，到郎溪姚村，然后回光山告诉我祖太太；我祖太太这一辈才下江南。先住在梅渚镇，住下来后，我祖太太也回去告诉他的堂兄，祖太太的堂兄们也相继下江南。”^{[4]137}

关于豫南移民下江南的方式，有四点需要说明。第一，一些家庭或宗族下江南后，出于生存需要，分居在不同的地方。据曾任郎溪县县长的广德人李斌说，100 多年前，他的第八世祖从光山县马畈镇小李寨迁徙至安徽宣城市，后李氏族人分成三支，“分别定居在安徽广德、浙江长兴、江苏丹阳”^{[4]34}。高尤卿说，他的祖先定居浙江安吉县天子湖镇高禹村后，随着家族人丁兴旺，开始“立辈分室，一门移至叶家冲，一门移至吴址，一门移至泗安，一门移至广德宋村”^{[5]341}。第二，部分豫南移民下江南后，经历过多次再迁移。浙江安吉县天子湖镇的杨成元说：“我们家族离开罗山先进入安徽到达广德县，又从广德来到天子湖的东亭”，“后来发现这里连个水塘都没有，无法种田栽秧，便又迁到安吉县的天子岗（也叫郭家湾）。但此地太小，四兄弟在这里蹲不下，又到处找场儿。最后找到个叫红颜庙的地方，盖了五间小瓦房才落下根来”^{[5]348}。第三，除了家庭成员和宗族成员，一些豫南移民还同其他关系人员一起下江南，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干兄弟和结拜兄弟。据浙江长兴县泗安镇双联村方家墩的光山县移民后裔陈树有说，130 年前，他的曾祖父下江南时，不仅带了 3 个儿子，还带了 1 个干兄弟^{[5]356}。南京市溧水区东屏镇白鹿村芦塘组的光山县移民后裔冷广武说，1910 年，他的祖父是和结拜兄弟一起下江南的^{[5]400}。第四，在豫南移民下江南活动中，除了血缘，地缘亦是一个重要纽带。一些豫南移民是和乡邻一起下江南的，还有不少移民是通过投靠先期下江南的乡邻才站稳脚跟。如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的罗山县移民后裔陶思豫说：“自同治年间开始，我们陶姓宗亲和乡亲们已有不少下江南了”，“一家一家、成群结队地或零散地‘一担箩筐下江南’，断断续续、一年又一年”；他的曾祖父和曾祖母带着 2 个儿子，于 1905 年“恋恋不舍地离开了生养的家乡”，“最先来到太湖之滨的浙江湖州长兴，因为这里有先期过来的罗山陶氏宗亲，还有许多熟悉的乡邻”，“后来又辗转到浙江南浔、乌镇两地，那里也有老乡和宗亲”^{[5]295}。

四、余论

综上，豫南移民后裔的回忆资料和口述资料清晰展现了豫南移民下江南的原因和方式。根据豫南移民后裔的历史记忆，太平天国战后至民国时期，导致豫南人民向外迁徙的因素包括人地矛盾、自然灾害、战乱、家庭变故等；豫南移民选择江南为主要迁入地的原因有江南土地荒芜、政府招垦、江南同豫南的自然环境相似以及豫南人民对江南有着良好印象等；在迁移方式上，豫南移民以血缘为纽带，以家庭和宗族为单位，向江南迁徙。

通过梳理豫南移民后裔的历史记忆，可以发现诸多之前被忽视的豫南移民下江南的细节。如以往研究未注意到导致豫南移民外迁的家庭变故等偶发因素。通过对该类因素的揭示，可以丰富对豫南移民外迁原因的认知。关于豫南移民迁居江南的原因，以往研究大多关注政府招垦和太平天国战争对江南的影响等因素，并无探讨豫南移民对江南有良好的印象、江南同豫南自然环境相似对豫南移民持续迁居江南的影响。

随着时间的推移，豫南移民后裔关于先辈下江南的历史记忆在流逝，一些记忆变得模糊不清，一些历史信息逐渐流失。同时，历史记忆是具有选择性的。豫南移民后裔在传承先辈下江南的历史记忆时，会有意无意地强化某些记忆，丢失另一些记忆。以上历史记忆的特征是导致在豫南移民后裔的记忆中，豫南移民基本以血缘为纽带，以家庭和宗族为单位迁入江南的原因。其实，除了血缘，地缘亦是豫南移民下江南的重要纽带。

注释：

- ① 文中的江南指皖南、苏南和浙北，豫南指今河南省信阳市所辖范围。
- ② 代表性研究成果有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六卷（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郭熙《苏南地区的河南方言岛群》（《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 年第 4 期）；郭熙《苏南地区河南话的归属问题》（《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 4 期）；葛庆华《近代苏浙皖交界地区人口迁移研究：1853—191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 年版）；葛庆华《近代江南地区的河南移民——以苏、浙、皖交界地区为中心》（《史学月刊》2003 年第 1 期）；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中华书局 2017 年版）；周波《近代东太湖流域的湖田开发与土客关系——以吴江县为例》（《地方文化研究》2019 年第 3 期）；张清改《太平天国战后信阳移民苏浙皖赣地区的历史与思考》（《农业考古》2019 年第 4 期）等。

参考文献：

- [1] 赵尔巽，等. 清史稿[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 [2] 信阳地区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信阳地区志[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
- [3] 晏兆平. 光山县志约稿[M]//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 125 号. 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89.
- [4] 光山县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 光山移民记忆[M]. [出版信息不详]，2020.
- [5] 韩勇建. 一担箩筐下江南[M]. 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20.
- [6] 罗山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罗山县志[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82—83.
- [7] 光山县史志编纂委员会. 光山县志[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93—94.
- [8] 宣城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宣城移民记忆[M]. [出版信息不详]，2017：201.
- [9] 曹树基. 中国移民史：第 6 卷[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 [10] 宣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宣城县志[M]. 北京：方志出版社，1996：2.
- [11] 张绍棠，萧穆，等. 光绪续纂句容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 35 册. 南京：江 苏古籍出版社，1991：231.
- [12] 葛庆华. 近代苏浙皖交界地区人口迁移研究：1853—1911[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 [13] 史式徽. 江南传教史：第 2 卷[M]. 天主教上海教区史料译写组，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217.
- [14] 孔令培. 艺苑漫笔[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229—230.

Reasons and Ways of South Henan Immigrants Going to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Based on the Discussion of Immigrant Descendants' Historical Memory

ZHANG Jinlin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nyang 464000,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ost-Taiping Rebellion period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large-scale migration of people from southern Henan occurred under the combined pressures of population-land tension, natural disasters, and warfare.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became a primary destination for these migrants due to factors such as abandoned farmlands, government reclamation policies, similarities in natural environments between southern China and southern Henan, and favorable perceptions of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among the migrants. These migrations were characterized by kinship networks, with families and clans relocating continuously to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Key words: Southern Henan immigrants; immigrant descendants; Go-to-the-South-of-the-Yangtze-River; historical memory; the Taiping Rebellion

〔责任编辑 姬明明〕

· 133 ·